



卓越学术文库 ■

《管子》伦理思想研究

GUANZI LUNLI SIXIANG YANJIU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王 辉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卓越学术文库 ■

《管子》伦理思想研究

GUANZI LUNLI SIXIANG YANJIU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王 辉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 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子》伦理思想研究/王辉著. —郑州:郑州
大学出版社,2016.5
(卓越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5-2992-5

I. ①管… II. ①王… III. ①法家②《管子》-伦理
思想-研究 IV. ①B2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9870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豫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2.5

字数:241 千字

版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2992-5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前 言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管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自西晋傅玄对《管子》的作者提出质疑以来,《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在《管子》的成书年代、学派归属、文字校勘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较大突破。然而,《管子》通常被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杂烩”,所以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从《管子》的部分章节而不是全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如此就难以形成对《管子》伦理思想的整体把握,也明显缺乏对《管子》伦理思想的系统探讨。其实,《管子》并非诸子百家的语录汇编,而是有其较为系统且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的。

《管子》关注的是社会治乱,是个体生命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有序,因而它的伦理思想直面现实并根源于现实,明显具有现实主义品格,但这并不是说它的伦理思想缺乏形上的价值追求与形上的理论之思。与之相反,与形下的道德实践相结合是《管子》伦理思想的突出特点。它以虚无之道为道德哲学基础,以人性之真为人事活动理据,将虚无之道与人性之真辩证统一起来,形成了形式多样和主旨明确的伦理思想架构。本书主要运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文本考辨与义理分析、比较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道德根据、道德范畴、道德教化、道德修养等几个方面,对《管子》的伦理思想做出较为详尽且系统的研究。

《管子》对道德根据的思考完全摒弃了西周时期畅行的天命论,指出人们行为的合理性不是受命于宗教之天,而是要遵从于虚无之道。作为宇宙万物的基础,道是生命之根、德性之源,其在现实世界中具体表现为一种天、地、人的和谐秩序,而人们的行为唯有合乎虚无之道,方可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道也因此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根据。在此基础上,《管子》形成了义利统一、公私兼顾、名实相符、德福一致的道德认识。而且,《管子》认为虚无之道不是先验地内在于人心之中,加之人性之中具有趋利避害之情性,而这种情性如若任其随意发展,就极易发展成恶行,因而需要人们主动运用心之思、辩、学的功能,自觉接受外在的道德教化与进行内在的道德修养。正是

基于此,《管子》提出了道德教化与道德修养的具体原则、方法与途径,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个体的道德境界,成就道德理想人格,从而实现个体生命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

在对《管子》上述伦理思想梳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管子》伦理思想中明显具有经济与道德的互动、刑法与德礼的辩证以及对因循之方的推扬等理论特性,这对当今社会精神文明的构建与道德水准的提升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录

绪论	1
一、研究的现状	1
二、研究的思路	7
三、研究的方法	10
第一章 《管子》及其伦理思想的形成背景	12
一、管子、《管子》及稷下学宫	12
二、《管子》伦理思想的形成背景	25
第二章 《管子》的道德根据论	37
一、“天有其常”之天论	37
二、“虚无之道”之道论	49
三、“人以德使”之德论	60
第三章 《管子》的道德范畴论	76
一、人性观	76
二、义利观	83
三、公私观	89
四、名实观	95
五、德福观	101
第四章 《管子》的道德教化论	109
一、道德教化的合理性论证	109
二、道德教化的理论设计	116
三、道德教化的实践路径	124
第五章 《管子》的道德修养论	140
一、道德修养的理论之思	140

二、道德修养的实践之方 148

三、《管子》的道德理想人格 157

第六章 《管子》伦理思想的理论特征及现代启示 168

一、经济与道德的互动 168

二、刑法与德礼的辩证 174

三、因循思想的推扬 180

结语 186

参考文献 188

后记 192

绪 论

《管子》是先秦文化典籍中的一部奇书,其所涉及的学派思想之多、所涵盖的研究领域之广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均属罕见。在学派思想层面,《管子》中既有道家气象浓郁的《心术》等四篇对形上之道的缜密审思,又有儒家气质浓重的《弟子职》等篇章对人伦礼序的严格规定,也有法家气象浓烈的《法法》等篇章对法术权势的推重阐扬,这或许也是《管子》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道家,而在《隋书·经籍志》中又被列为法家的主要缘由之一。在研究领域层面,《管子》涵盖经济、政治、哲学、法律、科技、农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因而,大多数《管子》研究者的视角也都聚焦于此,可以说这些领域的《管子》研究基本上都有学者涉足,并频出优秀成果。然而,从伦理学的视角,全面而系统地析出和呈现《管子》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还为数不多,所以,试图弥补这一缺漏正是本研究的主要努力方向和研究意义所在。

一、研究的现状

《管子》虽然没有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那样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但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还是有一些学者对其做出注释和解读,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在近代之前,对《管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版本的注释和考辨上,这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唐代房玄龄的《管子注》、宋代杨忱的《管子》原刻本、明代刘绩的《管子补注》、明代赵用贤的《管韩合刻》、清代王念孙的《管子杂志》、清代戴望的《管子校正》等。前人的这些研究成果为后世学者的《管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之潮流,对《管子》研究也就不再仅限于文本考据,研究重心逐渐偏重于对《管子》思想的探讨上。尤其是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管子》的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研究领域涉及哲学、



经济、政治、法制、伦理、军事、教育、外交等诸方面,相继刊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总体来说,这类研究成果大体上可分为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两种类型。所谓专题研究,就是对《管子》某一专题的深究,单一地从政治、哲学、经济、法制、军事、教育、外交等方面对《管子》的思想进行深入的考察与思量,挖掘出《管子》在这些领域的思想特征,如赵守正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①、乐爱国的《管子的科技思想》^②、张连伟的《〈管子〉哲学思想研究》^③、周俊敏的《〈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④等;所谓综合研究,就是对《管子》的整体之思考,多角度地对其思想体系进行综合性把握,从而形成论文或专著,如梁启超的《管子评传》^⑤、战化军的《管仲评传》^⑥、陈书仪的《管子大传》^⑦、徐汉昌的《管子思想研究》^⑧等都是基于此种体例上的优秀专著。

可是,与《管子》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管子》伦理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除周俊敏博士的《〈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和汤曾博士的《〈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两部博士论文外,其他《管子》伦理思想研究成果则多散见在各种学术期刊论文中。诚然,这些研究成果虽未能对《管子》伦理思想进行系统把握和详尽解析,但还是从某一维度对《管子》的伦理思想做出精准解释,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以下就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简要的梳理和总结。

在专著方面,周俊敏博士在其著作《〈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从《管子》的经济发展伦理思想、经济调控伦理思想、经济运行伦理思想等视角对其经济伦理思想展开论证,认为“国家本位”是它的经济伦理准则,和谐发展是它的经济伦理目标,“务本飭末”是它的经济伦理战略,功利主义是它的经济伦理取向,并且系统地论证了它的生产伦理思想、交换伦理思想、分配伦理思想、消费伦理思想。这是我国第一本对《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专著,无疑具有创新补白的意义。之后,汤曾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中着重把《管子》的经济伦理思想与相关的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并通过比较相当清晰地展现出《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特点、理论实质和自身规律。与周俊敏博士的研究相比,他加强了对《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研究,且运用“四环节法”,对《管子》的

① 赵守正:《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② 乐爱国:《管子的科技思想》,科技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张连伟:《〈管子〉哲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

④ 周俊敏:《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

⑤ 梁启超:《管子评传》,岳麓书社,1996年版。

⑥ 战化军:《管仲评传》,齐鲁书社,2001年版。

⑦ 陈书仪:《管子大传》,齐鲁书社,2008年版。

⑧ 徐汉昌:《管子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



生产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消费伦理等方面进行更为精细的探讨,这显然就进一步完善了《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

毋庸置疑,周俊敏博士和汤曾博士在《管子》经济伦理方面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讨,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学界的赞许,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他们的研究偏重于从宏观层面,用伦理的思维和视角解读《管子》的经济思想中所显露的道德问题,这难免就会忽视对《管子》伦理思想的形而上的理论问题,即对道德本体论、认识论、个体实践论等纯粹伦理问题的研究。

在论文方面,自从《管子学刊》创立以来,国内掀起了《管子》研究的小高潮,发表了大量的研究《管子》的学术论文,专门研究《管子》伦理思想的论文也逐年增多,其中不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下将以伦理学视角从道德根据、道德范畴、道德修养、道德教化等方面对这些成果的研究概况进行概括。

总体而言,凡是涉及《管子》的道德根据的文章,主要是围绕着《管子》的天论、道论、德论等层面进行论述的。在对《管子》之“天”的认识上,张岱年认为《管子》书中的“天”有时对地而言,有时对人而言。对地而言的天,是指物质之天;对人而言的天,是指自然之天。一言以蔽之,它所指的“天”是指天文现象而言,而不是主宰之天,这是与儒家所讲“天命”之天和墨家所讲“天志”之天截然不同的。^①然而,朱玉周和高良荃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管子》的“天”不仅是指具有自身运行变化规律的自然之天,而且还有至上神、自然神的含义,并且基于此,天人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是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天人感应”;二是人效法、顺从“天道”,利用自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主宰自然。^②

关于《管子》之“道”的研究,杨柳桥指出,《管子》之道与《老子》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认为“道”是宇宙间最初的、虚而无形的、无可比拟的动力或自然法则,这些动力或自然法则通过天、地、四时的运行呈现出来,而且人的行为准则也应该遵循此“道”。如果顺应“道”而行为,那么就会转危为安,化败为成;反之,如果违逆“道”而行动,那么就会虽立不安,虽成必败。同时,万物的生成和存在都要依赖于“气”,“有气则生,无气则死”(《枢言》,241页)^③。因此,他认为《管子》对“道”的认识既有唯物主义的因子又有唯

① 张岱年:《〈管子〉书中的哲学范畴》,《管子学刊》,1991年第3期。

② 朱玉周、高良荃:《〈管子〉天论浅析》,《管子学刊》,2007年第1期。

③ 本书《管子》文本以黎翔凤的《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为准,以下仅注篇名和页码。



心主义的成分^①。丁永志则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管子》虽然是从《老子》书中吸收了“道”的概念,但是它也把“道”称作“精”,指出“精”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即最精细的“气”,所以它对《老子》之“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化为朴素唯物主义的一个最高范畴。^②张岱年则指出,“道”贯通万物,是《管子》的最高范畴,它显然来自《老子》,是老子思想的推衍和发展。^③相对而言,张连伟对《管子》之“道”的探讨更为全面,他认为,长期以来,对《管子》道论的研究,主要以《管子》四篇为对象,这无形中局限了对《管子》道论的深入认识。因而,从整体上来看,《管子》的真正理想追求是圣王之道,它在本体论上表现为虚无之道,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表现为静因之道。^④

对于《管子》之“德”的探讨,张岱年先生认为《管子》书中的“德”具有不同于“德行”“品德”的另一种意义,即是一物所得于道的本性,其所具有的“德”就是道的具体所在^⑤。孙熙国先生和黄维元先生分别从哲学、伦理、政治和经济的角度阐述了《管子》思想中的“德”之内涵,认为本体论上的“德”,即万物得之于道而具有的内在的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是万物成为物的内在根据和规定性;认识 and 意义上的“德”,即是对道的认识和存养,是认识主体对道的体认和把握;政治上的“德”,是与法、势、威并用来实现王霸天下这一中心目标的手段;经济上的“德”,是指将德与利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德本身就包含了利,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人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就是体现了“德”的价值。^⑥而许建良先生指出,“德”产生于“道”,是“道”在现实世界中的具象,也就是说,“道”是“德”的根由,“德”是“道”的形下显现;“道”与“德”之间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区别的,之所以将它们加以不同的表示,主要是标明“所以舍”与“舍之”的关系;“道”“德”舞台上面的演员是芸芸万物,“德”在不同的个物中实现着不同的样态,“道”也在与万物的共作里展示着自己无形而无限的力量,从而形成切实可感的即物而行、即物而是、即物而性、即物而德的“道”“德”链。^⑦胡火金先生则强调,《管子》中的“德”因循“天德”“帝德”观念,强调“德”与“道”相通,与自然秩序节律及其生态机制相切合;“德”由上而下,始于君王,教化百姓,是仁、义、

① 杨柳桥:《〈管子〉的哲学思想》,《管子学刊》,1987年第2期。

② 丁永志:《论〈管子〉书中的哲学思想》,《青岛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③ 张岱年:《〈管子〉书中的哲学范畴》,《管子学刊》,1991年第3期。

④ 张连伟:《〈管子〉道论述要》,《江淮论坛》,2007年第6期。

⑤ 张岱年:《〈管子〉书中的哲学范畴》,《管子学刊》,1991年第3期。

⑥ 孙熙国、黄维元:《〈管子〉德论研究》,《管子学刊》,2003年第4期。

⑦ 许建良:《〈管子〉“道生德”的辩证法》,《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礼、法乃至一切社会的基础,在“富国安民”“经世致用”中具有统领性的意义。^①

不可否认,以上学者对《管子》的天、道、德等哲学范畴做了较为精准的解析,不过,他们的研究大都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解释《管子》的天、道、德,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管子》天、道、德等做出解析的并不为多见,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对《管子》的道德范畴有所涉及的论文为数不多,仅有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对它的人性论加以探讨,至于公私观、名实论、德福观等方面则极少有人述及。在人性论上,梁启超、罗国杰、陈少峰、沈善洪和王凤贤等学者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都认为《管子》书中所述的人性是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我们认为,他们关于《管子》人性论的观点过于简单,有些及表而不及里,因为他们把“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视为《管子》人性论的全部,只重视人之情性,而忽视了“人主安静”的心性以及情性与心性的辩证统一。

对此,陈世放所述的《管子》人性论就比前述学者们的观点更为全面、客观,他认为《管子》的人性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君德论、民性论、心性论。其中的君德论是《管子》人性论思想的中心,因为《管子》通篇谈论的是治国之道,而治国的关键在于君主,所以必须详察民情,了解民性,顺乎民心,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君德的表现就是虚其欲、静其心、得其道。民性论是《管子》人性论主要阐述的对象,也是《管子》人性论的主要内容,它的本质就是趋利避害。心性论则是君德论和民性论的逻辑中介,因为情欲是人性的外在表现,无论是君性,还是民性,都脱离不了情欲的本性。^②

诚然,陈世放对《管子》人性论的分析相对比较精细,指出《管子》分人性为君德、民性、心性三个层面,且逐一对它们做出哲学分析和伦理论证。然而,他的分析过于强调道德个体因社会角色不同而表征的人性之“异”,却没有看到道德个体的人性之“同”,只是从静态层面对《管子》的人性论进行区分,而忽略了《管子》人性论中的“人主安静—趋恶欲性—反其本性”辩证发展的逻辑结构。

严格地说,学界对《管子》道德修养的研究明显重视不够,即使有这方面的研究,也大多是从方法论、意识论、认识论的角度研究其心性修养,如《〈管子〉的方法论思想初探》^③《〈管子〉的意识论及其修养学说》^④《从“静因之

① 胡火金:《〈管子〉中的“德”及其现代价值》,《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4期。

② 陈世放:《〈管子〉人性论思想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

③ 杨国荣:《〈管子〉方法论思想初探》,《齐鲁学刊》,1985年第4期。

④ 常大群:《〈管子〉的意识论及修养学说》,《枣庄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道”到“名实当”——《管子》认识论浅析》^①等论文。但是专门从伦理学视角研究《管子》道德修养的方面很少有人涉及,也罕见与此相关的研究论文的刊出。其实,如果仔细研读《管子》文本,就会发现《管子》不仅存有许多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而且其道德修养理论是系统和精当的。譬如,《管子·心术上》就曾明言:“‘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虚矣。虚者,无藏也。”其实,“修之此”就是修养道德主体之心,道德主体只有保持内心的虚静,不受原有的主观知虑的控制即达到“无藏”的状态,才能避免将个人的一己之见强加于他人和他物,才能公正地处理与他人和他物之间的关系,而这一思想为后世的大儒荀子所承继和发展,运用于其道德修养论中。

关于《管子》的道德教化方面的文章颇多,主要是从道德教化原则、道德教化的必要性、道德教化的手段、道德教化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等角度进行阐释的。谭佛佑着重论述了《管子》礼法结合的道德教育思想,认为修己正身、立中生正、过反于身、周密慎言、虚一而静、杜事于前、行小禁微等是其道德教化的具体内容,并指出如要使道德行为得以形成,法制教育和道德教化就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两者均不可偏废。^②其实,作者有些将道德修养同道德教化混同,把一些道德修养的内容置于道德教化的名下,这是在进行伦理思想研究时应该加以避免的。

朱克良在《管子教化思想探微》一文中指出,《管子》的教化思想不仅是齐国称霸的有力武器,而且对当今的社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从而肯定了研究《管子》道德教化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他从人性与教化、政治与教化、刑赏与教化、经济与教化、风俗与教化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管子》的道德教化思想^③。可以说,作者基本上把握了《管子》的教化思想的精髓,紧扣文本而没有泛泛而谈。

迟丕贤在《试论〈管子〉的道德教育方法》一文中对《管子》的道德教化方法做了阐释,认为《管子》的道德教化方法包括训诲、率先垂范、环境陶冶、行小禁微、制度引导、“与事变,与俗化”等六种^④。总的说来,作者所总结的《管子》道德教化方法相当精到,与《管子》本义相符。

综上所述,《管子》的研究成果日益剧增,许多学者业已意识到《管子》的学术价值,并出版了一批优秀著作与论文,为今后进一步研究铺平了道路。

① 孙玉锁:《从“静因之道”到“名实当”——〈管子〉认识论浅析》,《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② 谭佛佑:《论〈管子〉的教育思想》,《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

③ 朱克良:《管子教化思想探微》,《琼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④ 迟丕贤:《试论〈管子〉的道德教育方法》,《管子学刊》,1999年第3期。



但是,这些著作与论文对《管子》的伦理思想涉及较少,专门研究《管子》伦理思想的著作更不多见。而且,现有的《管子》伦理思想研究成果要么仅关注《管子》的某个伦理范畴,要么偏重于对《管子》道德修养或道德教化的探讨,而对《管子》伦理思想的整体性审视和全面性把握明显不够,尚需更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管子》伦理思想本质上是既注重对道德现实的实然考量,又重视对道德理想的应然诉求,它不同于理想化的儒家德性主义伦理,也有别于现实化的法家极端功利主义思想,呈现为以功利主义为主又兼有德性主义导向的伦理体系。因而,在紧扣《管子》文本的前提下,运用中国伦理思维和伦理话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管子》伦理思想进行挖掘整理,以彰显其义利并举、公私分明、礼法并行的理论价值及实现其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换,这对于当今个体的德性涵养和社会的和谐有序不仅是急需的,而且是必要的。

二、研究的思路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伦理学研究不仅要体现出哲学研究的共性,即运用形上之思管窥道德现象与道德价值之真,不断追问道德之所以存在的根由,而且要保有其独特的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因为伦理学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也就是说,伦理学研究一定要有其明确的研究视域与问题域,尤其是在做一个历史人物的伦理思想研究时更应该如此,因为“伦理道德研究,自然要依据伦理道德的规则。……具体分析某个人物的伦理思想时,应该讨论什么问题才能展现其伦理思想的全貌,不明确这一点,就难以进行有意义的研究”^①。

不仅如此,虽然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没有把学术思想分为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几大类,也没有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严格区分,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古代中国无此类学科的证据。事实上,以伦理学为例,中国古代思想家历来不乏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可以肯定地说,伦理道德问题自始至终贯穿于经、史、子、集^②等古籍之中。不难想见,中国古代伦理学与西方伦理学均是以道德行为、道德现象、道德价值等为研究对象,所以两者必然有相同之处。可是,由于思维方式与研究视角的不同,两者在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问题域等方面还是存有一

① 许建良:《魏晋玄学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②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学科分类方法,这表明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学科分类,只不过是分类方法不同于西方的学科分类方法而已。



些相异之处的。张岱年先生曾经把中国古代伦理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人性问题、道德最高原则和道德规范问题、礼仪和衣食问题、义利与意欲问题、“力命”与“义命”问题、“志功”问题、天地的道德意义问题、修养方法问题等八个问题^①，这种归类颇为精到并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因而，在张先生归类的基础上，笔者根据《管子》文本的实际情况，试图通过对道德依据、道德范畴、道德修养、道德教化等四个主要问题^②的具体解析，使得《管子》伦理思想得以梳理与呈现。

伦理学是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不仅要关注“道德之是”等道德现象，而且要深究“道德之所以是”“道德之所以必要”等道德根源问题。可以说，前者主要是对社会道德行为、道德心理、道德意识等道德现象的形下归纳与描述，所关涉的是道德的具体类型或现实样态；后者则更多是探究这些道德类型与伦理样态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其产生的根源等形而上的问题。如果仅仅对道德根源等形上问题进行探讨，伦理学研究就可能成为一个“迂远而阔于事情”^③的思想幽灵。同样，如果仅仅注目于对道德现象形而下层面的描述，伦理学研究也可能成为一个缺乏主根的无神之庙，也就是说，这种研究无论对道德现象描述多么精准，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令人采信。

因此，研究《管子》伦理思想，首先必须探讨其对道德的产生、根源、本质等道德依据问题的认识。《管子》书中不仅详尽论述了“道”“德”等范畴以及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首次把“道德”一词连用，提出了“道德定而民有轨矣”（《君臣上》，557页）的伦理命题。在《管子》看来，作为自然存在物，天已不能成为人之德的主宰，即上天无德；作为宇宙万有的一个种类，人性既不可定言为善的，也不可归结为恶的，而是静之心性与趋利避害之情性的辩证统一，故人并不具有先验的良心与善性，即人心无德与人性无德。那么，人之德为何？又是从何而来呢？《管子》认为，人之德是人把无形之道内置于心、落实于身的状态或境界，具体而言就是把人的趋利避害之情性限定于合理性范围之内，恢复人的静之心性，进而达致“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内页》，939页）的大清明状态。而且，人之德的实现途径是必须发挥人的心之思虑的功能，并通过德性之知而识道、体道、得道。

①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② 本思路获益于许建良先生的观点。他在《魏晋玄学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道德的根据、道德的范畴、道德教化、道德修养、道德人格等五个问题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问题域。

③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39页。



质言之,《管子》认为“道”作为宇宙万有之本根,是“德”的前提与基础;“德”作为具体事物之内在规定性,是“道”在现实世界与现实生活中的外化与具象;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之德,人之所以有德也就是在于能“得”“道”,即“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以然也”(《心术上》,770页)。如此,《管子》把道德的产生与展开理解为是一个“道—德—得”的动态发展过程,这显然既不同于把道德视为上帝之诫命的基督教伦理学,也殊异于心中有德、德生于心的儒家心性伦理学。需要说明的是,《管子》的虚无之道仅是形式上的无形,不是绝对的虚无,也就是说,它要通过“道—德—义—礼—法”的具体化过程落实为人类社会的礼法规范或制度来呈现自身,这也使后者获得了其存在之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形上根基。

不可否认,《管子》的“道—德—得”道德图式是其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既是对社会现实道德状况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又要成为超越现实道德状况的价值导向。而这种价值导向的呈现必然要体现在其对人性、义利、公私、名实、德福等道德范畴的阐释上。具体而言,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道德,自然不能绕开对人的本质或本性的探讨,即追问何为人之存在或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管子》对此问题的认识既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论,又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动态地把人性看成静之心性与“趋利避害”之情性的辩证统一。显然,人的趋利避害之情性存在着趋恶的可能性,这就极易导致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与利益、义与利的紧张与冲突。不过,与儒家所倡导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不同,《管子》得出了“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2页)的道德命题,认为道德与利益、义与利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对义利问题的探讨,又不得不引出对公私问题的思考。在《管子》看来,人的趋利避害之情性是不可磨灭的自然事实,所以人之私欲也是不可以人为去除的,只不过人之私欲的满足与实现不要损害大道之公,即不可“私情行而公法毁”(《八观》,272页)。可是,在社会现实层面,总是有人为谋取一己之私而欺世盗名、弄虚作假,结果造成名实不符的假象。或许正是看到“名实之相怨久矣”(《宙合》,222页),《管子》才提出“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九守》,1046页)的名实观,其目的是避免“德不当其位”“功不当其禄”“能不当其官”(《立政》,59页)等名实颠倒现象的出现。显然,名实颠倒现象的泛滥极有可能给人造成“有德遭祸,无德得福”的道德困境,进而动摇人们循道蓄德的道德信念。为重塑人们德福一致的道德信仰,《管子》明确提出:“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枢言》,254页),认为人只要循道而行就会福将自致,反之就会遭遇灾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页。



祸。总之,通过以上对道德根据与道德范畴的较为系统且全面的探讨,基本上可以把《管子》伦理思想的理论层面得以呈现出来。

一般而言,任何伦理思想体系的构建都要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并希冀在现实社会呈现自身,所以,《管子》不仅重视对道德理论层面问题的探讨,而且关注对道德教化、道德修养等道德实践层面问题的深究。既然《管子》认为人的趋利避害之情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可人为去除。而且,人的这种情性一旦无任何约束,就极有可能产生无序竞争,破坏社会和谐,造成不良后果,所以,这就需要后天人为的规范和教导,既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又为道德教化指明了方向,即去恶向善、化恶为善。基于此,《管子》给出了仓廩之实、师法之教、率先垂范、习俗之化、神道设教等道德教化之方,以确保人的情性之满足与道之发展并行不悖。可是,道德教化对个体而言毕竟是他律性的道德实践,如若让其真正发挥效用,自律性的个体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因而,《管子》非常强调心之修养的功能,认为心为人的九窍之主,只要人心能够正确地做出道德判断、道德选择,就会达到身心合一,德不离身,即“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内业》,938页)。而心治的实现途径就是要求心“无藏”“无知”“无欲”,避免忧乐喜怒欲利等情感的干扰,做到“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心术下》,778页)。可见,《管子》不仅确证了个体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而且给出了具体的道德修养之方。总之,一旦实现了道德教化与道德修养的有机结合,人们就将主动节欲控情、去恶扬善,完成自我道德迁化,提升自我道德境界,达至其所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人格。

三、研究的方法

如前所论,本研究在精读《管子》文本及其他先秦著作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管子》的伦理思想加以整体把握与全面审视,故主要的研究方法如下:

其一,在总体上,坚持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的研究立场对《管子》的伦理思想进行研究。本研究侧重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解读《管子》的伦理思想,因为任何思想总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生成的,都是时代精神的浓缩,如果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抽象地研究伦理道德,那么这种研究就可能成为研究者的个人主观臆见而丧失学术说服力,这是在进行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研究中应当加以避免的。因此,本研究不仅注重对《管子》的道德范畴和概念的分析,强调《管子》的哲学本体论对其伦理思想的影响,而且在《管子》伦理思想生成的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背景下,在道家、儒家、法家的思